

真实的阿富汗是怎么样？

阿富汗战争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。阿富汗的现实情况远没有那么美好。

1. 没有眼泪的孩子们

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列夫·托尔斯泰如此描述那个年代背景下的沙俄。在当下的阿富汗，梁红如此总结：每一个人都是悲惨的，不同的是各有各的悲惨。

在喀布尔，我们尝试去靠近一些阿富汗人，跟他们聊天，听听他们的故事，看看他们的生活。各种让人鼻子发酸的倾诉，让人感到似乎每一个人的生活，都被黑暗笼罩，被恐惧束缚，悲惨和意外始终如影随形。

我经历过汶川地震的汉旺现场，我进入过摩加迪沙的难民医院。今天，我们走进了喀布尔的一所战争伤害急救医院。

在战争国家的白色建筑里，这似乎是一个收容悲伤的容器，满满地盛放着一个一个渺小人物的眼泪、不解、疼痛和绝望。

医院是国际人道组织援助的，有一些无国界医生在这里服务，救助战争受伤病患。进去前，我们还被搜了身。一方面防止恐

怖袭击；另外一方面，对里面那些身体和心灵都饱受战争伤害的人来说，武器出现在他们眼前都会是莫大的刺激。

接待我们的，是一位意大利女医生，吉奥吉娅（Georgia），她戴着厚厚的眼镜，留着一头卷发。她向我们介绍，这里接收的所有病人，都是因为枪击、地雷、炸弹袭击等遭受到伤害的不幸者。

吉奥吉娅和几名同胞在这里工作，但是每天都会有很多新的伤员送到这里。于是他们就着手教一些当地人急救和手术的知识，让他们帮忙参与救治。吉奥吉娅告诉我们，这里的所有治疗全部免费，医生和志愿者们，不会去问他们的受伤原因，也不会询问其政治派别和信仰。为了不刺痛他们，也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。

所以，进了医院她向我们提议，如果要拍摄最好先征得病人的同意，而且最好不要把镜头对准孩子。我们默默地点了点头，外面的那些轮椅上的雄鹰，在坚强地活着匍匐前行；而这里的很多伤者，可能根本就不能活着走出医院。

医院院子的一角修建了一个简易的儿童乐园，里面摆放着一些玩具，它们只是静静地摆在那里，甚至落了灰，并没有孩子在陪伴着它们。

病房里长长的两排病床，每张都没空着，被患者占据。人很多，却异常安静。病人们都安安静静地待着，脸上没有表情，眼睛无神，木讷空洞。或许他们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行走在路上被流弹击中，跟家人在屋子里被落下的炸弹炸到，

跟朋友闲聊被突然的爆炸波及……命运的无常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得如此清晰而震撼。

似乎在战争国家，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，都如困牢笼，无人可以幸免，平安只是一种奢望。

我们走过一个小男孩的病床，他眼神呆滞地盯着天花板，躺在那儿一动不动。这个孩子来自阿富汗东部的边境地区，本来他和小伙伴们正在巷子里追逐玩耍，突然就发生了恐怖袭击，他扬着笑脸奔跑的步伐，被几颗突如其来的子弹给截停，他的腹部中枪，童年里被烙上一道深深的伤疤。

见到我们的摄像机，孩子问我们可不可以给他拍照。当拿着照片时，他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。这个孩子在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吉奥吉娅医生说，再有四五个礼拜他就可以下地走路了。伤痛在慢慢地愈合，希望留在他心里的阴影也能逐渐散开。



他还没来得及品尝世间的精彩，已被卷入战争的旋涡。



她才三个月大，就被战争波及。

另外一个孩子脸上还罩着呼吸器，整个身体都被厚厚的纱布给包裹了起来。他是昨晚才被送到这里来的。昨晚城南发生了交火，这位 4 岁的小朋友，在家里被几颗流弹击中。

紧急手术挽救了他的小生命，他的眼神里满是惊恐，似乎还挣扎在昨晚的惨剧里。见到我们手上的机器，他脸上的肌肉扭动起来，瞳孔放大，小手乱挥。我们赶紧收了起来。

4 岁的孩子，刚开始懵懂地认识这个世界，战争却抢先跑来「问候」，并在他的体内留下几颗冰冷的子弹，让他的人生在伤痛和恐惧中起步。梁红走近他，想给他一些安慰，一个抚摸；她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，眼泪「唰唰」地就下来了。

病房的角落处，床上蜷缩着一个小小的身躯，那是一个 8 个月大的女婴。「庞大」的氧气面罩几乎完全遮盖住了她的小脸蛋，她身体的大部分也被严实地包裹着。女婴的小手无力地在空气中摆动，嘴里发出微弱的「咿咿呀呀」声，眼睛半睁着，看着病床边年轻的母亲。

她的妈妈年纪应该很小，围巾遮挡下只露出一张满是伤痕的脸，呆呆地坐在孩子的病床边，如雕像般看着前方，纹丝不动。脸上的那种表情无法言说，是在控诉这莫名的伤害，是绝望地妥协，或许已经是接受了这无边的黑暗生活。

梁红上前握了握小孩的手，再也绷不住了，扭转头捂着嘴哭了出来。

这安静无声的病房里，那些无光的表情，那些呆滞的眼神，是这个国家、这些人民生活痛楚的残酷表达。孩子们还没来得及拥抱这个世界的美好，还未绽放成一朵鲜艳的花儿，就已经受到战火的摧残，早早地凋零败谢。

梁红含着眼泪问吉奥吉娅医生：「这个孩子情况怎么样？能不能活下来？」

吉奥吉娅看了一眼孩子，无奈地说：「愿真主保佑。」

梁红没有再问，快走几步出了病房，再也忍不住了，放声哭了出来。我心里也完全不是滋味儿，默默过去揽过她的脑袋，让她靠在我的肩头。

眼泪从来都没法浇灌出希望，也无法愈合伤痛。我们被感染的情绪、被击中的悲伤，无法释放。

行走越久，见得越多，愈发增添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对这个世界的那些残忍，那些无名的、无端的伤痛，我们走过，我们亲历，我们无可奈何。

2. 沉默的布卡

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，阿富汗这个国家看上去一直处在倒退的轨道上。

三四十年前，喀布尔街头看不见武装车，也不是举目皆枪；姑娘们可以穿得花枝招展，花布衬衣、高跟鞋、短裙，长发、蝴蝶结，想怎么拾掇自己就怎么拾掇。

然而现在，已经有国际组织给阿富汗冠上了这个名头：全球最不宜女性生存的国家。在这里，接近 90% 的女性遭受着歧视和暴力，每年有超过 700 名女性被杀。要知道这个国家，总共才 2700 万人。

宗教遗祸是变异的民俗，仿佛看不见的牢笼，将女性牢牢禁锢其中。而看得见的牢笼，也每日与她们为伴：布卡。

进入这个国家，我们看不见任何成年女性的脸，一袭或黑或白的长袍，把她们从头到脚包裹住。外面的世界，只留给她们一方网眼儿来窥视。

在塔利班执政时期，对于女性的歧视和荼害，在法规条例里令人发指地存在着：禁止女性上学接受教育、禁止暴露自己的身体、禁止穿颜色鲜艳和紧身的衣服、禁止与丈夫以外的男人说话……可以说，她们的世界被局限在小小的一间屋子里，可以说话的人也仅仅只有丈夫、儿女，而且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对等的。

塔利班政权已经倒台，然而他们留下的乌云始终未散，不止女性，男人和小孩依然生存在其遗毒之中。而且塔利班依然在这个国家广袤的土地上无处不在地存活着，无形地威胁着每一个人。

我们在阿富汗的向导，叫迈赫迪（Mahdy），他的妻子——准确地说是他的家庭，也是受害者。迈赫迪的妻子叫巴托尔

（Batool），在伊朗长大，是一位独立、自由的女性，他们俩在互联网上相识，并最终跨越国界，在现实里走到了一起。

2008 年这对恋人完婚，他的妻子也离开了伊朗，来到阿富汗生活。

接受开放思潮教育的巴托尔，见到阿富汗的广大女性竟生活在如此的环境之中，决心要为女同胞们做点儿什么。她自己率先力行，拒绝穿戴布卡出门，并且开设了女性培训班，帮助女性维权。她还坚持写博客、写诗，把自己的眼见和呐喊，通过互联网传播出去。

直到有一天，一封来自塔利班的信摆在了迈赫迪家的门口。信中警告巴托尔停止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否则他们会针对她实行暗杀。

无可奈何之下，巴托尔只得再次离开国家，离开自己的丈夫和家庭，独自逃到了国外。

塔利班不当权了，但是他们依然威胁着人们的安然生活，除此之外，那些沉痾顽疾的思想，也存在于很多极端民众的思维里。在阿富汗，杀死一个女人实在是太容易了。

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，一位女警察因为其性别被无端杀害。一位走上街头倡导女性平等自由的姑娘，因为人群中一个极端分子高喊一声「她撕毁了《古兰经》」，就被狂怒的人们当街用乱石砸死。

走在喀布尔街头，我们看到的除了满眼残破的建筑，还有那些步履匆匆、穿着布卡沉默走过的女人。我总会去想，面罩之下的这个人的样子，此刻她有着什么样的表情？她们是否会笑？她们是否还心存希望？她们是否有脱下布卡的那一天？

现在已经进入 21 世纪快 20 个年头了，交通工具和互联网的存在，已经让这个世界的联系更加亲近，沟通更加便捷。而在这个国家里，女人们与外在世界，始终隔着厚厚的一层布。

一个国家的倒退，我们不想去关心政治，不想去关心宗教，不想去关心经济，只想去关心其国民的生活。时代在前进，这里却在沦陷，为什么会这样？

我在资料上、照片里，知道阿富汗以前的样子；现在身在其中，看着它现在的样子，我想畅想一下它以后的样子。可是，眼前的种种，让我的脑海里始终勾勒不出一个有色彩的画面。

倒退已经是一种无法接受的残忍，而更加让人心痛和无奈的，是逐渐习惯和没有希望。这是国之殇，民之难。

3. 黑纱下的眼泪

我们无法去揭开人们头上的黑纱，但是我们可以去揭开布卡下的故事。在喀布尔城南的贫困街区里，我们敲开了一个独居妇女的家门。

屋子很简陋，没有灯，依靠半扇天窗取光。摆设的一些家用品，多是从外面捡回来的。女主人叫莎拉（Sara），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，依靠平时为别人洗衣物挣点儿钱，养活母子二人。萨拉说，她并不惧怕生活的拮据和贫穷，她害怕的是始终笼罩在心头的恐惧。

我们刚进门时，隔着黑纱依然能听出她声音里的紧张。她怀里的小男孩见到我们这些陌生人，眼里没有好奇，全是恐惧。

她害怕敲门声，每当有人敲门她都会心惊胆战，紧紧地抱着儿子，不敢开门，不敢言语。她害怕让儿子独自外出，担心一个无端的意外就让母子生死两别。

原来莎拉是一位饱受家庭暴力残害的妇女，她的丈夫染上了毒瘾，时常对母子二人大打出手。萨拉说，从自己一出生开始，女性的身份，就注定了她的一生会是一幕悲剧。

在 17 岁的时候，父亲告诉莎拉有人上门提亲，希望她能出嫁。她和那个男孩仅仅有过十分钟的交流，随后就结为夫妻了。这在我们看来十分无稽和荒唐的一幕，却是阿富汗大多数

女性人生的真实写照。因为没法选择自己的性别，继而她们的整个人生都失去了选择的权利。生活、教育、婚姻、繁衍、家庭，她们只有被动接受，她们只是男人的从属。

婚后没多久，丈夫就开始对她动手，有事没事一顿痛打。莎拉的生活，除了照料丈夫、孩子的生活，每天还要做繁重的粗活，而且挨打也逐渐成了每天生活里的一部分。她无法反抗，只能默默承受着，甚至眼泪，都只能在丈夫看不见的时候，才能去偷偷擦拭。

这样的状态，让莎拉做了自己人生里的第一个自主选择，离婚。她本以为离婚了，就可以摆脱暴戾的前夫，然而没想到她的身体和心理，却遭受到了更大的伤害。

前夫还是经常来敲门，无端地恐吓她、殴打她，甚至比离婚前还要变本加厉。

听到这里，我们都满腔愤慨。梁红问：「难道警察不管吗？」

莎拉把手伸进面罩里，轻轻地摸眼泪，然后摇了摇头：「没有人会管，在阿富汗，遭受家庭暴力的女人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自杀，要么就是趁机下毒毒死自己的丈夫。」

在这种情势之下，莎拉无能为力，寻求不到任何帮助和庇护。莎拉说：「我现在每天都在担惊受怕地活着，有人敲门我就会心头一紧，害怕是前夫又来了，害怕他会杀了我，害怕他殴打孩子。可是我们又不敢出门，到处都是袭击、汽车炸弹。」

「可是，我们又去哪里呢？」

听到这儿，梁红红着眼眶，既有同情也有无奈，而我全是愤慨。这种感觉，这种活生生的故事，实在太让人生气，压抑。我已经听不下去了，起身去门外抽烟，想压抑住此刻心头的业火。我特别想破口大骂，在我的世界里，一个男人，对家庭对妻子，应该有的是责任，是关爱。而眼前的这个家庭，不，肯定不只是这一个家庭，它只是一个缩影，告诉我的却是如此的一番景象，所谓家庭就只是一家之主的那个男人的小帝国，他可以肆意妄为，他可以无法无天，于我们而言生命里最重要的妻子、孩子，在他们的眼里就是可以随意鞭挞的牲畜一般。

我没有再进屋，后面的故事我已经没法再听下去了，我担心自己会失控。可是，和莎拉一样，我又能做什么呢？

不是我侠义感爆棚，小时候我们都曾幻想过自己能成为一个英雄，行侠仗义，匡扶济世，打抱不平。长大了我们变得所谓的成熟了，不再不切实际地想当英雄，但是那些关乎正义、平等和怜悯的诉求，是根植于一个正常人的内心深处、流淌于血脉肌理之中的。

我们可以同情，我们可以愤怒，我们所有成年人的情绪，都可以让自己消化掉。可是这种眼见残酷却无可奈何，这种深深的无能为力感，让我无所适从，让我坐卧不安，心神不宁。那一刻，我出奇地愤怒，这甚至是我想去躲避的借口。

梁红出来后，先是一言不发，缓和了很久的情绪之后，才终于开口，转述了莎拉最后的话：

「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带着儿子离开这个国家，哪个国家都行，只要去一个他找不到我们，无法威胁我们的地方。或者只

要能把孩子送出去也行，让他不用担心父亲的恐吓，不用担心路边的炸弹，不用担心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子弹，能够安全地活下去。」

4. 「我是一个导演」

至少还有一个女人，在阿富汗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。

她叫萨拉·卡里米（ Sahraa Karimi ），是一位电影导演和制片人。向导迈赫迪向我们提起她，我就急切地想去拜访这位女士。这件事儿这太过惊奇，我知道在这个国家，没有一家电影院。

路上迈赫迪简单地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她，他了解得也并不多，我们知道了个大概。这个女人在阿富汗是异类，也是个名人。

她的父母在她出生前，为时局所迫逃离阿富汗，去了伊朗，萨拉也得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长大。四年前她进入伊朗最好的大学之一，攻读电影导演的硕士和博士学位。

在伊朗，她本该有着美好的前途，但是萨拉却半途结束了自己的学业，在进入大学一年后，就选择了离开安全的伊朗，返回故土阿富汗。

来阿富汗这些天，战争的遗迹和痕迹遍布，一切都是老旧的、破败的；一进萨拉·卡里米的办公室，我们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，那是久违了的「正常」的空间。

一张大办公桌，上头摆着笔记本电脑、打印机、计算器、笔筒等办公设备，书柜靠墙立着，堆码着录像带盒和一些书籍。空出来的墙壁上，贴着众多好莱坞巨星的海报，马龙·白兰度、格里高利·派克、玛丽莲·梦露、奥黛丽·赫本等人，悉数在列。窗台上，摆着一尊小金人。

窗外的风撩动窗帘，外头阳光穿透树叶闪烁，抛开这是在阿富汗而言，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；可是这间办公室是在阿富汗，就让这一切变得怪异和难得。

它的主人笑意盈盈地站在我们面前。萨拉可能是第三位我在阿富汗见到真容的女性，梁红算一个，电视山上的那位女老师是另外一个。萨拉没有戴布卡，只有一面天蓝色的头巾轻轻地搭在头上，我更倾向于认为那是她的服装搭配。蓝白碎花的上衣穿在她身上很好看，此前我们只见过穿着单一素色的女人。下面是牛仔裤，搭配着一双蓝色的皮鞋。手上戴着金银色的首饰，还有手表。这样的穿着打扮，入境以来，我眼里仅此一位。

她的英文很好，脸上也一直挂着笑容。对于她，我有太多好奇和太多的问题想去问。我如此迫切地想去了解这个女人，比如她的生活、她的工作、她的想法；不知道梁红看到这句话会不会嫉妒。



阿富汗唯一的女导演：萨拉。



在游乐场我再次看到了萨拉的笑容。

我的第一个问题，是她为什么要离开伊朗。

她仰头想了想，说：「伊朗很安全，但是我在那里却感觉并不自由。在别人的国家，我们始终都被当作一个外来者，而且受到种种限制，我是个阿富汗人，我想回到自己的国家，于是我就回来了。」

「可是阿富汗一直在打仗，这里很危险。」

「是的，恐怖袭击、枪支炸弹、无休止的战争，还有人们难以摆脱的思想禁锢，漫长而艰难的重建，等等。这个国家现在不好，这个国家现在不安全，所以我就更该回到家乡，因为我还抱着希望，我应该为我的国家做点儿什么。」

这话似曾相识，以前在索马里，医院里的那位武汉大学毕业的小伙子说过类似的话。当年听到，对他是一份赞赏和敬意；这次从萨拉口里说出，我不再只是肃然起敬，我更感到一股震颤和豪迈感。

这里不仅是一个不安全的国家，还是一个对女人处处束缚的国家，她的选择我们不必去理解为民族大义，而仅仅是一个国家公民的个体小梦想。她归来的脚步毅然决然，我却似乎看到步步豪迈；她的述说轻描淡写，我却似乎感觉到燃起的星星之火。

在和萨拉聊天的时候，有一些她的朋友们也前来拜访，有诗人，有设计师。在他们含笑的交流里，在他们讨论设计稿的专注中，我仿佛觉得这片萨拉的小天地，是藏在阿富汗的一个乌托邦，一座伊甸园。

在开口邀请萨拉一起去户外走走的时候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担心可能会给她带来危险；不料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。她说这么多人在一起，她很安全。而且她指了指我们的摄像机，说：「我也很愿意带你们去看看阿富汗，可能你们拍的东西阿富汗人看不到，但是你们可以让更多的外面的人看到，来了解我的国家，来帮助阿富汗。」

萨拉决定自己开车，其实在我们知道她有车有驾照的时候，非常地惊诧。在一个遍地布卡、百般禁锢的地方，女人开车这事儿，实在是太过艰难了。

梁红坐上了萨拉的车，迈赫迪一下子就急了：「不行，太危险，女人在马路上开车，真的会被极端分子攻击的。」

梁红很坚持，我看了她一眼，同意了。我知道梁红的意思，我们不能为萨拉做更多，梁红坐进安保车萨拉应该也不会有意见，但是她更想坐在萨拉的身边，想用实际行动告诉萨拉我们对她的支持，希望她能够把自己这种生活和信念、坚持自我的勇气坚持下去。

对梁红自己而言，去陪着萨拉走一段路也很重要。萨拉似乎是孤身走在一条艰险的路上；而梁红伴我的这次西行，于她也是艰难重重。她想更踏实地去踩下每一步，想更亲近地去靠近路上遇到的人。

迈赫迪无奈地摆摆手，终于还是同意了，不过补充了几条禁令：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都不要停车；然后，关上车窗不要让外面的人看见你们。

梁红后来告诉我，车跑起来后，萨拉打开了音乐，开心地跟她聊着天；安保刚刚给她的那些警告和压力感，瞬间就没了。她觉得坐在萨拉的车里特轻松，是出了中国国境之后从没有过的那种轻松。她们还是摇下了车窗，愉悦真的是可以感染和辐射的。

我们去了市中心的公园，我悄悄地退到了后面，让梁红去陪萨拉度过这一天。让这两个坚强的女人，去互相诉说彼此的故事和心路。

她们玩了旋转木马、空中飞车，还下到湖里去划了船。她们坐在岸边，像闺密老友一样聊着女人的话题，或者还有关于梦想、人生和国家这样的讨论。波光粼粼，蓝天白云，树荫婆娑，阳光温柔地抚摸着一切，和风也不甘寂寞地上前凑热闹。

我们把视线往上抬一点点，不去想那些无休止的袭击，不去专注于那些破败的痕迹，眼前就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盛世画卷。

5. 「为我的祖国拍一部电影」

一个电话打破了眼前似乎有点儿不真实的美好景象。政府通知萨拉，她的办公室附近发现了好几颗炸弹，要她返回协助处理。

似乎从一个美梦里乍然醒来，哦，我们还在阿富汗。萨拉向我们告别：「很羡慕你们的生活，你们是想通过旅行，更好地认识自己吧。」

三人会心一笑，挥手再见。

想起关于阿富汗的小说《追风筝的人》里最后一段：每逢春天到来，它总是每次融化一片雪花；而也许我刚刚看到的，正是第一片雪花的融化。

在离开萨拉办公室前，我们录了一段萨拉的心里话。我想在这里，代我们的朋友把它如实呈现出来：

我是一个电影导演，我拍摄关于阿富汗的故事，但是让人沮丧的是，我们国家还没有电影院。我的电影能够在阿富汗上映，能够让阿富汗人看到，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。

五年前我拍摄了《方向盘背后的阿富汗女人》，素材量才 100 个小时，我却拍了三年，因为我需要经常换地方，打游击似的拍摄，我害怕被人杀掉。我并不害怕死亡，但是我还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做完。

最后我还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剪辑这部影片。窗台上的那座小金人，是这部电影在孟加拉电影节上获得的。对此我很骄傲，但是也很失落；电影从来都不是为了奖项而拍，而是为了观众。这部电影是为阿富汗人，为阿富汗的女人而拍摄的，可是他们却看不到。

这很让人难过，我的电影有时候会在欧洲，在其他国家放映，但是在自己的国土，却无人知晓。我们国家甚至有一两代人，都不知道有电影和电影院。

我写过剧本，叫作「喀布尔的钢琴师」，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。

在我们国家有一个传说，在遥远的山区，有一个湖泊，随着太阳升起，白云会在湖面跳跃。当然这种情形不是谁都可以见到的，只有勇敢与善良的人才可以。而且湖水有神奇的治愈功能，人下到水里，无论身患什么顽疾，都可以痊愈。

因此我想拍这样的一个阿富汗小女孩儿，她 14 岁，她的父亲在国外结识了她的母亲，两人相知相爱并走进婚姻殿堂，然后迎来了她的降生。她出生后，全家从国外回到了喀布尔。有一次，他们全家一起去探望爷爷，结果遇上了塔利班的袭击，爷爷遇害了。父亲受伤，妈妈也因此崩溃，疯掉了。

人生遭遇如此变故，小女孩儿却没有屈服。她喜欢弹钢琴，当她知道神奇湖泊的故事后，就开始更加努力地练习钢琴。在阿富汗弹钢琴是被禁止的，但是她不害怕，仍然夜以继日地弹着。她想以后能成为一名钢琴师，挣到钱后就带妈妈去神湖那里。

这个剧本，我递给过无数的海外影视公司和电影节，没有人愿意投资拍，他们都说，这个故事太积极了，太正向了，这不是阿富汗。有一些西方人在阿富汗投资，但是他们却不肯发展阿富汗的文化，因为文化会让人产生自主意识，有意识就会思变。西方人不想看到阿富汗的改变，他们似乎不希望看到阿富汗拥有真正的和平。

所有国外的人拍阿富汗，都要把这里拍得很穷、很乱，都是负面。他们总是在呈现阿富汗有多惨，生活多么艰难。他们拍的东西，永远都是在说阿富汗人逃离祖国的故事，却从来没有人拍摄过阿富汗人归来的故事，阿富汗人心怀希望、渴望改变的故事。

我从未丢失过希望，我永不放弃改变的决心。

我是一个女人，在自己的国家里步履艰难，我甚至不能在外面走路、购物、进餐；像我这样的穿着打扮，出门真的会有很多人上来杀了我，不只是塔利班，还有很多当地的男人们。他们不是塔利班，但是他们的脑袋里，都住着一个塔利班。

我想工作，我想改变，在这里真的非常非常困难。似乎我们女人该想的，就是什么时候会死。

在这个国家，坏人比好人多。于我而言真的很沮丧，因为我去过国外，去过欧洲，见识过外面的世界，然后现在又回到如牢笼般的家乡。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虽然我总是在笑着，但是心里始终是被难过占据着的；不管如何，我还是会坚持笑下去，因为我必须要用这种乐观的态度，来抵挡和消弭那些苦难和阻碍。

我选择了带着希望回来，就必须要承担这种矛盾和痛苦，这是我们这代人，在国家的剧变和过渡期必须要承受的。这大概也就是我的人生使命吧。

再难再危险，我都会留在这里去坚持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

6. 王宫里的孩子

在战争面前，历史的荣耀都躺在废墟里哀伤。

在返回驻地的途中，我们绕道去看了阿曼努拉·汗王宫，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，我只能通过残垣断壁的轮廓，在脑海里去勾

勒它昔日辉煌的模样。

将近百年前，阿曼努拉·汗这位年轻的国王，带领阿富汗人民脱离了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，并且结束了部落和封建权贵掌权的时代，将这个国家带上和平统一的道路，并且积极推行改革。这位「少君主」近乎乌托邦似的想将阿富汗带上富强、世俗化的道路；这其中，就包括女性解放。

遗憾的是，阿曼努拉·汗没有切实考虑国情的改革，很快就招致了叛变，他的政府班子垮台。在一次匆匆的复辟失败之后，他便被迫远离自己的国家，开始了 30 年的流亡生涯，并身殒他乡。

后来的阿富汗的继任领导者们，相继搬进这座王宫，成为这里的主人。但是阿曼努拉·汗王宫，始终是其唯一的名字。

除了带领国家迈出独立的第一步，阿曼努拉·汗留给阿富汗的，现在似乎就只剩下这座见证过其当年荣耀的王宫了。而眼前的景象着实让人难过，已经看不见一丝辉煌穹顶的痕迹，灰黄和伤痕累累的墙壁，静静地曝晒在阳光之下。偶尔几丛绿树，也显得寂寥凄凉。

王宫前，有一个小孩站在那里卖鸡蛋，但是他面前的盒子里，只摆着一个鸡蛋。孩子的身后是一截土墙，上面涂了一行字：
Find each other （找到同胞，团结一致）。

没有庄严护卫和哨岗位，取而代之的，是散漫横亘在门前的一圈铁丝网。院子里插着一面阿富汗的国旗，没有风，旗面牵拉

在旗杆上。光秃秃的楼台之上，扎在其间的鸟窝，野雀啾啾，似乎在言说这里旧时王谢堂前的荣光。

王宫地处喀布尔西北角的山上，可以俯瞰整座城市。塔利班战争爆发后，这里成了战略要地，政府军和塔利班武装分子反复争夺，炮火中这座国家象征性的建筑，终于变成了现在的模样。

前几年塔利班活动猖獗的时候，这里还经常有军警守护，防止塔利班武装分子跑到这里，往城市里发射炮弹；如今，它已经连一个象征性的守卫者都没有了。因为国家安全形势问题，它也无法变成一个遗迹或者景点，供人参观。

现在陪伴着王宫的，只有那些来这里玩耍的孩子，他们或许并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故事。能找到一处这样的乐园，没有大人，也没有爆炸和流弹，算得上是他们童年时代的一个大发现吧？

几个小孩儿在宫殿废墟的一角打闹，见到我们，他们一下子凑了上来，好奇地问东问西；他们说的都是波斯语，我也听不懂在说什么。突然一个身穿皇家马德里球衣的小孩，向我们比画有没有纸和笔。



在王宫附近玩耍的孩子，他们通过写纸条向我们索要礼物。



阿曼努拉·汗王宫，如今被铁蒺藜围绕着，冷冷清清。

不一会儿，他在小伙伴们簇拥下，递过来一张纸条。上面用歪歪斜斜的英文写着一些单词，语法有错，但是我们能看懂：

你是中国人吗？

你有多少兄弟？

我叫莫哈姆。

小伙子挺可爱的，我被逗乐了，一板一眼地回答他。他很快又写了第二张纸条，问我们有球吗，他们想要一个球。

我有点儿愣，问他们要什么球，足球、篮球还是排球。小伙子们一顿叽里呱啦，我一句没听懂。迈赫迪说，对他们来说，只要是球，是圆的就行。

这个小愿望我一定帮他们实现，就让一个安保队员去买。当他拿着一个足球、一个排球回来的时候，孩子们都疯了，笑得嘴都咧到耳朵根儿上去了；他们一拥而上接过球，先是球在谁手里就扎上去都去抢；接着扔在地上就光着脚丫子，呼呼啦啦地追着球跑了起来。

在千疮百孔的阿富汗，在孩子中间，我们总是能看见一些纯粹的快乐。一份小小的礼物，希望可以让他们的这份快乐持久，去迎接长大后将必须要去面对的艰难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